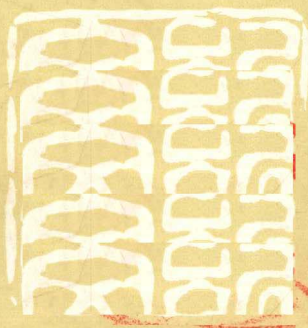


黎锦熙先生逝世五周年

纪念文集



信阳师范学院情报资料室

黎劭西先生逝世五周年

紀念文集

梁漱溟題簽



黎锦熙先生遗像

目 录

黎劭西先生传略	附年谱	黎泽渝 (1)
黎锦熙 (1890—1978)		〔台湾省〕关国焯 (26)
《比较文法》后序		黎锦熙 (30)
“汉字新部首”拟案举例		黎锦熙 (36)
四十多年来创拟“汉字新部首”的回忆		黎锦熙 (47)
古今作品分析“图解法”简说		黎锦熙 (53)
黎劭西先生赞		郭绍虞 (76)
在语法方面我继承了黎锦熙先生的哪些东西?		
		史存直 (78)
黎锦熙先生与国语运动		〔香港〕梁容若 (85)
黎锦熙老师和他讲授的“宋元明学术思想概要”		
		张清常 (103)
我国文字改革的先驱者黎锦熙		白吉庵 (106)
“注音汉字”还应提倡		孙崇义 (113)
黎劭西先生《传略》和《年谱》读后感		潘 菽 (84)
回忆先师黎劭西先生		高元白 (119)
追怀黎劭西先生		叶圣陶 (29)
怀念黎劭老		周谷城 (25)
怀念劭西先生		王 力 (135)
题劭西先生《廿年纪事诗存》		王 力 (135)

追念黎锦熙教授.....	冰 心 (135)
追怀黎劭西先生两绝句.....	顾颉刚 (136)
追怀黎劭老.....	吕叔湘 (139)
悼念黎劭西师诗十绝.....	朱 星 (137)
恸悼黎翁.....	张文煊 (77)
怀念黎劭西教授.....	王静如 (140)
纪念劭西先生逝世五周年.....	文 炼 (142)
纪念《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 在费城世界博览会展出五十周年.....	赵步杰 (142)
忆良师.....	张寿康 (143)
PROFESSOR LI JINXI [美国] Chin—Chuan Cheng	(148)
编后记.....	(151)

黎劭西先生傳略及年譜

許慎珩題

黎劭西先生傳略（附年譜）

黎 泽 渝

先父黎錦熙（字劭西）湖南省湘潭縣人。一八九〇年出生在一個以科第起家為名宦的“書香門第”，其族祖黎樾喬為清廷御史，祖父黎世綏宦游兩粵、湖北、山西、熱河、安徽等省，父黎培鑫為清貢生，終年居家。其祖父和父親都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因此，先父自幼受着祖國文化熏陶，四歲時就以《詩經》為“啟蒙”教材，十來歲時好作詩、繪畫、刻印、吹洞簫。當時在家治印繪畫的導師即齊璜（白石）先生。十一歲時已讀完《十三經》，《文選》也讀完一半，諸子及唐宋文熟讀數百篇，古今體詩讀至萬首。所以先父能夠作各體詩及駢、散文。

傳統的經學容易束縛人們的頭腦，但是，先父卻未為傳統思想所束縛。這與當時社會思潮和塾師的引導有很大關

系。他幼年时“西学东渐”，所谓“新学”和“维新”思想，通过他的塾师不断地灌输到他幼小的心灵里。他不再埋头于“子曰”“诗云”，开始关注着列强对祖国的蚕食与瓜分，忧虑着民族与国家的命运。一九〇六年他从偏僻的晓霞镇来到省府长沙，以一个弱龄青年的勇气，组织起“德育会”，以“牺牲个人，努力救国”为号召，鼓动有志青年以“救国”为己任。这正是他敢于与传统的旧思想决裂，勇于追求新思想、新目标的证明。

先父二十二岁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史地部毕业后，就开始了他的近七十年从未间断的教育生涯。在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他认为救国之路必振兴教育，而教育之振兴，尤在于教育之普及，以开发民智。他在湖南省立编译局编写小学教科书时，把《西游记》选为课文，这在当时还是创举，颇引起教育界的惊骇。同时他主张教育必须改革，应该改文言文为语体文。但为时过早，未能实行。随后他在湖南一师邀集杨昌济（怀中）、徐特立等诸友人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把介绍欧美新书和编纂中、小学教科书及民众课本作为首务。在当时，国体虽早已改“君主制”为“共和制”，但学校课堂仍被《四书》、《五经》、骈、散文言等封建文化统治着，争取用语体文编写课文，在教材中引进致知实用的知识，这在当时是很大的革新。先父和同人们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它的影响超出了一城一省。教育部擢拔人材的时候，先父被聘为教育部的教科书特约编审员。当时仍然存在着“国文”与“国语”之争，他力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

先父在近七十年的教学实践中，总是把教育的普及化、

大众化和科学化作为努力的方向。他纂写出版了大量教育学的专著。如：《教育学讲义》《新著国语教学法》《本国语文教学法纲要》《大学语文课程指导》《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新国文教学法》《我们的任务》等等。并编写出语言学、文学、目录学等学科的许多讲义。凡是听过他讲课的人，或者亲聆过他的教导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毫不保守，他愿意把自己的所有知识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人民。他真心诚意地希望青年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几十年来他为祖国培养了许许多多教师和语言文学专家。

先父在长期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广博精深的学术研究，涉及到语音、训诂、语法、文字、修辞、文学、史地、教育、哲学、佛学、目录学等学科，在这些领域里大都有较深的造诣和丰富的著述（据我不完全统计已出版的论著约有六百余种）。正是在这广而深的学术研究基础上，他能够在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辞典编纂三个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先父于二十六岁来到教育部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的时，潜心于语言文字的研究，他认为普及教育最迫切最根本的问题是国文字必须改革。在他及同人的倡议和组织下，一九一六年“中华国语研究会”正式成立。他为该会拟定的宗旨是：一、国语统一，即规定标准语。我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方言复杂，进行国语的统一工作，意义极为重大。作为国语统一的第一步是他促成教育部在一九一八年公布注音字母（一九一三年“全国读音统一会”决议的）以及常用汉字的标准国音。二、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话文。他认为对当

时占统治地位的文言文体必须革新，否则，拼音新文字必将导致切音之故辙。因此他竭力提倡普及白话文。

“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斗争是极为激烈的。先父和同人们共同努力于一九二〇年及以后的几年促成教育部改订小学到初中的“国文科”为“国语科”，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废除小学“读经”。先父还发起领导了苏、浙、皖三省焚烧小学文言文教科书运动，以示对封建文化的坚决斗争，震动了全国，影响很大。同时，他与钱玄同先生创办了白话文的《国语周刊》，他说这个刊物的出版是“大炮响了！”是的，这是射向旧思想、旧文化的大炮。

“欢迎投稿，不取文言”的《国语周刊》与“布告征文，不收白话”的《甲寅》（是当时的司法总长后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主办的杂志）对垒作战，直至胜利。先父与同人们发起的国语运动成了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最有战斗力的一翼。

从一九一六年教育部成立“中华国语研究会”直到一九四七年“国语推行委员会”，从解放后“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组成到今天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前后凡六十余年，先父始终任委员或常委。

关于注音符号的修订，注音符号草体的创制，国语罗马字的创拟，一九三二年国音新标准的制订，《国音常用字汇》的颁布，注音汉字铜模的设计，一九四一年《中华新韵》的制订和颁布，《国语词典》的编纂以及许多推行国语的法令，先父常是主持人或主要参与者。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先父对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省的国语运动的关怀和贡献。他认为台湾沦陷五十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台湾一定能够光复。台湾的方言极为复

杂，再加上日本文化的影响，因此，台湾最需要国语统一运动。于是一九四四年五月在他的倡导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白沙）、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璧山）创办了国语专修科，为台湾光复后推行国语训练人才。台湾光复后，“黎门弟子”为推行国语前往台湾的达一百余人，对台湾国语运动起了巨大推进作用。

全国解放以后，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先父又积极参加研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及查字法等项工作。并出版了《中国新文字论》《增附中华新韵》《中国文字与语言》《论注音字母》《文字改革论丛》《字母与注音论丛》《汉语规范化论丛》等文改著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父是耄耋之年，仍写出二十余种论著，并在二十六个拉丁字母的基础上创拟了两个字母拼写汉语一个音节的“汉语双拼制方案”。他为了推进祖国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不知疲倦地工作了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

“‘任重’能背，‘道远’不退。快快儿地慢慢走，不睡！”

先父在语法学上的贡献。“五四”运动时期，鲁迅先生以白话著作《狂人日记》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基础，显示了白话文的无限生命力。但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头脑里，只知道文言文有法可循，这就是《马氏文通》。至于白话文也有法可循，也有所谓“文法”（语法），却是个难于理解的事。“国粹派”们声言：你们虽然有“文学”，却无“文法”，有“文”无“法”，终是无以为“文”。斗争十分激烈。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捍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先父于一九二〇年就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国文系首创讲授《国语文法》课，用大量例证阐明白

话文不仅有“文法”，而且其法缜密，足以指导为“文”。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他归纳了中国白话文学和口语的法则，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揭示了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于一九二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著国语文法》。此后他对此书的一些观点、体例和例句续有修订。到一九五五年印第二十二版时，已是第四次修订了。先父生前说过，对于《新著国语文法》的品评，应以第二十二版及其以后诸版为准。到一九五五年印行到二十四版，足见学术价值及深远影响。一九三三年又以《新著国语文法》第四章为纲，对古今中外词位及句式进行比较，撰写出版了《比较文法》。解放后，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十八课》和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陆续出版的《汉语语法教材》（三大编），是用来代替他二十年代编的《新著国语文法》的。“《十八课》代替《文法》的前三章，并依新观点改成小册子，使语法实用化、大众化、普及化。《语材》则是在这普及基础上提高化、理论化、科学化。”（引自一九五八年黎锦熙《关于语法体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直到晚年他还继《〈实践论〉语法图解》（一九五八年江苏出版社出版）之后写成了《〈矛盾论〉语法图解分析》（油印本三大册）。他在学术研究上认真严肃，有创造性，既敢于革前人的命，也敢于否定自己的错误，革旧立新与时代俱进，决不故步自封。

先父为了编纂我国的大辞典，辛勤劳动了一生。一九一七年他在教育部提出了《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内有“《国语辞典》之编订”一项。一九二三年促使“国语统一筹备会”设立了“国语辞典编纂处”。他认为“要对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因而不能不给四千年来的

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账，以资保障而便因革，则具体化的工作，惟在辞典，唯在‘大’辞典！‘国语’又嫌流于狭义，就叫‘中国’大辞典吧！”（引自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卷四200页）。一九二八年他领导的“国语辞典编纂处”改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时候，计划中的《中国大辞典》“规模务求大。材料务求多，时间不怕长，理想尽高远，全然学术化”（出处同上）。编纂处下设搜集、调查、整理、编著、统计五个部。计划到一九四八年成书三大册，共三十卷。由于这是庞大而繁重的准备工作，加之经费不够，又遇战事频繁，所以这项普及文教、整治学术的伟大工作终于未能完成。但是搜集整理的三百多万张卡片，可视作不成书的“大辞典”，这些卡片及其它资料档案（解放后已全部捐赠给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室），为今天我国编辑大型辞典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珍贵的经验。并且从一九三二年着手《中国大辞典》编写工作时，先父和钱玄同先生任总编纂，钱氏主字之形体声韵，先父主义训及复合词，印出了《中国大辞典样本稿》《中国大辞典长编》。从而由长编组成了论文。如：“巴”字十义及其复合词和成语一册，“芭蕉”“蓑荷”考辨一册，“把”字用法之引申一册。此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副产品”还有不少。一九三四年已统计出关于语言、文字、声韵、文法，释词及戏曲小说等考证之作达二百余种，共约六百卷（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四卷316—355页有“副产品”的书目举要）。由先父主编出版的《国语辞典》、《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增订注释国音常用字汇》及《中华新韵》对汉语规范化（正字、正音、辨义）有着重要而

深远的意义。解放后为应社会之需，先父领导着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同人们迅速编纂出版了一批中、小型辞典字典，如《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的简编）、《学习辞典》、《同音字典》、《学文化字典》等等。先父把编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大辞典》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直到晚年，他还向中央写了：请求中央组织《中国百科大辞书》的编写工作的建议。

先父中等身材，晚年更显得清瘦，两眼总是流露出睿智和慈爱的目光。他说话稳重缓慢，坚决而有条理，从无疾言厉色。他好学深思，从不肯浪费时间。他认为一个人的知识成就来自刻苦勤勉，持之以恒，看准方向一干到底的精神。他曾勉励他的学生说：“不怕不宽宏，就怕太笼统；不怕不聪明，就怕不宽容；不怕不用功，就怕乱翻动；不怕不奋发，就怕如炮炸；不怕胆不大，就怕少规划。”（引自：梁容若《黎锦熙先生与国语运动——敬悼黎劭西先生》一文，刊于香港《抖擞》杂志第29期。）这些深入浅出而饱含人生哲理的语言，曾使多少学生感到温暖和受到鼓舞，向着知识的高峰奋进。

他持之以恒，看准方向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贯穿于他一生之中。他做任何事情，无论大小，有始有终，动必有功，处必能久。就以记日记来说，有许多人都记日记，但是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而又有多少人呢？而先父从十二岁记日记以来，一直记到八十九岁临终前夕。这近八十年的日记，单就持之以恒的精神说，也就给人们以极大的启发教育了。就其内容看，记载他一生经历了的清末、民初、帝制复辟、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历史阶段，对于当时的国内外大事，政治变动，政

权废兴、自然灾祥、学术进展、人物品评、朋友来往、社会生活和工作情况各方面，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述。他的日记是一部中国近代史料（如今已全部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就日记的文字形式说：从一九〇一年开始，用文言体，写行楷“汉字”；一九二二年以后改用语体，写“注音符号”；一九二六年后改写“国语罗马字”；一九五七年后改用公布的“汉语拼音”书写；一九七〇年后一直写他自创的“汉语‘双拼’新字”。他利用写日记的机会，不断实践，检验各种拼音方案的优劣，从而不断创新前进。

先父的一生是追求进步的一生。

辛亥革命时，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在长沙“湖南一师”任教的时候，与毛泽东同志相识。他五十多年来收藏着毛泽东同志一九一五年——一九二〇年给他的六封亲笔书信，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一年主编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以及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主持的《平民通讯社》油印稿十五期。这些极其珍贵的革命文献于解放后献给了中央档案馆。

一九二五年，先父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代主任、五月九日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秉承北洋政府的旨意，悍然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事后，杨氏推诿责任，先父与鲁迅先生坚定地站在一起，支持女师大学生的驱杨斗争，并公开发表声明，揭露了杨荫榆诬陷和迫害进步学生的阴谋诡计。当女师大被迫迁往宗帽胡同办学后，他又与鲁迅、钱玄同先生等一起义务教课，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同志从延安给先父寄赠了一本《论持久战》，先父当时在陕西城固西北师院任教，他

组织同人们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父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号召，他与许德珩、潘淑等同志共同发起组织的“九三学社”，把许多有名望、有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贡献了力量。

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想把部分名教授窃走，给先父送来了飞往台湾的飞机票，他严正地加以拒绝，并满怀激情地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城。

解放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生中第一次参加了国家的政权工作。他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各界代表大会代表，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主席团。

一九五四年他写下了七律《天安门参加盛典》：

“一年两度此城楼， 前值清和后值秋：
劳动万邦新令节； 共和亿众旧神州。
青云遏鼓传嵩响， 红浪翻旆引铁流。
多病却无迟暮感， 相逢握手尽交游。”

这首诗歌颂了新中国，表达了他老当益壮、奋发努力的精神。

解放以来，他受到党中央无微不至的关怀，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毛主席亲临北师大教员宿舍，宴请先父和其他教师，关怀其生活、工作情况；一九五〇年——一九五四年又两次亲笔复函，指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文字改革字母拼音等工作；一九五三年派人送来珍贵药饵：人参果、驴胶、红参、参水糖、麝香、贝母、虫草等；多年来毛主席、周总理都常派人到家中问候，并多次邀先父去中南海共宴。一九七二年他将自创的“汉语双拼”方案亲呈周总理时，总理关切地

说：你身体不好，要多休养，我们前些日子还提起你，你没有助手怎么行，要有助手。事后，总理派人到我家探望。当毛主席、周总理得知先父居住条件很差，就指示搬迁到一个四合独院，使他有个方便的生活、工作环境。一九七三年五月，我作为工作人员，陪同先父参加周总理接见赵元任先生的外事活动会。当时，已患重病的周总理还迎上前紧握先父双手，亲切询问先父的年龄、身体、工作，嘱咐他多多休息，并向我询问先父的近况，嘱咐我照顾好先父的生活。周总理还关心他的近著的出版问题。

在党的关怀下，先父干劲倍增，虽已是残年病体，但他决心把余年全部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他忘我工作，勤奋治学著书。同时还日夜思念台湾的回归、祖国的统一。一九六二年春节先父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约对台湾广播后，梦见台湾解放了，他乘宇宙飞船绕行地球，醒时赋《沁园春》一阙：

“解放台湾，雾净波澄，风举叶飘。笑星沉海，
当窗历历，河源雨过，隔坐滔滔。远掠层空，近探园
月，银汉翔孰比高！从天降，又百花齐放，万种妖娆。

球映日星娇，瞰海岸回环尽舞腰，叹向戍弭兵，徒
劳唇舌；屈原爱国，空赋离骚。民主阵营，和平堡垒，
谁在张弓学射雕？拭目看，被东风压倒，曾不崇朝”。

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父受到党中央的保护，但仍然不能避免“四人帮”在工作、生活、精神诸方面的迫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没有停息语言科学研究，写了近三十种学术论著。

粉碎“四人帮”后，他欢欣鼓舞衷心拥护，他决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一九七八年一月他致函党中央，提

出在繁荣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应尽快发展社会科学。但是，不幸得很，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先父因病住入医院，在病危中他仍反复要求出院工作，关心着语言工作的进展。三月二十七日上午，他举起插着输液管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审订了由我记录整理的他在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会上的书面发言稿（发表于一九七八年《中国语文》第二期），计划着出院后的科研工作，他充满了对科学春天的热爱，对美好未来的信心。然而，当晚（二十三时三十七分），他就与世长辞了。终年八十九岁。

附：黎劭西先生年谱

一八九〇年二月二日（清光绪十六年庚寅正月十三日）

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晓霞镇石潭坝。

一八九三年（四岁）

始从塾师读书，以《诗经》为开蒙教材。

一八九七年（八岁）

学“八股”破题。

一八九八年（九岁）

阅海国图志及瀛寰志略，能随手默画五洲中图。

一八九九年（十岁）

参加“罗山诗社”。

一九〇〇年（十一岁）

读“十三经”“文选”及古、今体诗、文言，进习“八股文”，每晚作一篇。